中国式风险传播为何难以进行——以被忽视、曲解和夸大的专家声音为视角

摘要：针对中国式风险传播中专家进行的传播与群众接收到的信息有明显差异的现象，本文以专家为视角、对专家的声音被忽视、曲解和夸大的原因进行探究。本文对中国式风险传播中专家角色的独特地位进行分析，同时以“组织危机”理论、风险的社会放0大理论为基本框架，结合中国独有的双重话语空间的特点对专家在风险传播中各个环节的作用进行探讨。通过结合具体实例，本文分析了对专家在风险传播中具体环节中发挥作用的不足之处并尝试给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风险传播；信任危机；风险的社会放大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科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化、复杂化。中国的风险传播起步较晚，现仍有很大问题。其中，专家的声音被群众忽视、曲解和夸大，从而无法遏制风险的社会放大的发生的现象十分明显，严重影响了中国风险传播的效率和效果。然而中国是一个正在以很高速度发展的国家，要面对大量的风险传播难题，因此亟需一个合理完善的风险传播体系。专家掌握专业化的风险知识，作为风险传播的关键角色，应改进不足，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中国风险传播的顺利进行。

1. 中国式风险传播的现状
2. 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以及其在中国的体现

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是指相对小的风险，有时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甚至经由“涟漪效应”的作用，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的社会现象。[[1]](#footnote-1)

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的一个关键的产生原因就是群众和专家对风险的认识方式不同。专家在社会中是一个垄断知识的角色，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知识精细化，专家掌握着群众难以掌握的专业知识，故能从理性角度分析判断风险。而群众更关注风险发生时的危害性，是从一个相对感性的角度认识风险。二者对风险认识角度的差异导致了两方立场上的冲突。因此，群众往往不能认识到风险的本来面目，从而对夸大风险事件带来的影响，产生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的社会放大能否被有效控制是风险传播是否能有效进行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卡斯普森等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存在多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信源上，他们关注大众传播带来的巨大影响；在信道层面，他们认为正式和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以及人际网络等方式对风险传播语境化，是群众一种重要的验证感知风险的方式。政府、专家、群众意见领袖等社会站之间的互动，如设置公共议程等方式都是风险放大的重要节点。[[2]](#footnote-2)不受控制的风险放大是具有不同观点的多方不能得到良好沟通、交互不良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风险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减小或遏止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然而在中国，这种社会放大现象得不到很好的抑制。在吉林双苯厂爆炸事件中，不负责任的媒体报道、舆论风波、时间长且范围广的后续事件等都使群众内心的恐慌加剧，使得影响超出正常范围。[[3]](#footnote-3)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政府、专家、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专家是唯一掌握风险真实面目的群体，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专家若能在风险的社会放大的各个环节中更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难以遏制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现象。

1. 中国式风险传播的特点

（一）风险传播的西方范式

传统的危机传播研究采用的是线性的“组织危机”模式，传承自早期传播学“传者-信息-信道-受者”模式。[[4]](#footnote-4)在此基础上，危机传播学又发展出了许多理论，如“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但并未抛弃这一基础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专家扮演传者角色，主要在官方信道发言，对群众进行风险传播，群众即是风险传播的最主要受者，同时也是一个传播能力极强的传者，主要在非官方信道如大众媒体等平台发言。传者决定信息表征的信号，并利用自己的信道将信息传递给受者，从而完成风险传播。

（二）中国式风险传播的显著特点——双重话语空间

中国式风险传播区别于西方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双重话语空间。中国双重转型社会特征、多元化传播生态环境、中国媒体双重属性等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存在两个明显对立但有交错的双重话语空间：一个是主要以官方的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的官方的话语空间；一个是以互联网等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的非官方话语空间。[[5]](#footnote-5) 在双重话语空间中，同样作为传者，专家主发言的官方信道与大众发言的非官方信道，交互较少、存在一定的割裂性，使得两者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但同时，专家作为公众的一员，有其在非官方信道的独特影响力，如体现为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大量粉丝等。

（三）双重话语空间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的影响

在双重话语空间中，非官方信道是群众最直接接触的、接触最密切的信道。官方信道在大众传播这一社会放大的关键信源发言的机会严重受限。同时，双重话语空间的割裂性使得正式和非正式信道难以统一观点，使得两种风险传播语境化不相同，从而出现群众倾向于听信占据优势的一方信道的观点。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政府、专家和群众的公众议程不能及时推进，使得风险在群众中进一步放大。因此，专家的发言通过使得官方信道在传播中取得优势，影响非官方信道的主流观点，从而使得非官方信道的的言论理性化是达成风险传播的预期效果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1. 中国风险传播实例中专家进行传播过程中的缺点

（一）非官方信道中，专家发表言论的“声音”过小

若想在风险传播中取得优势，专家需要更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目前，非官方平台中非官方的言论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通过制造恐慌获得流量的谣言，使得专家试图进行的风险沟通在互联网大量的信息中难以被广大群众关注到并从谣言中分辨出来。这种现象使得非官方信道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风险传播不可控。过去使用的传统媒体会有意识地持相对审慎的态度、相对中立地报道事件。然而新型媒体则不同。

以山东民众反对如山红石顶核电站建设的个案为例。官方信道的传统媒体在250篇报道中有219篇对核电站持中立态度，表达了各方考虑的同时也会对谣言进行澄清。但是，尽管官方信道已经对核电站建设的风险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作为非官方信道重要平台，新浪微博关于“乳山核电”的讨论中，持支持核电站建设立场的微博占比几乎为零。[[6]](#footnote-6)专家没有充分发挥其在非官方信道的影响力，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使得非官方信道的形式一边倒。因此较为感性的怀疑思想占据优势，使得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无法遏制。

（二）专家发表言论的即时性不足

非官方信道的发言者和受众极多，对于任何时间传播的各种信息都会有及时的反馈，一些信息会在短时间内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因此，如果想要达到遏制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的目的，将存疑问题向群众澄清、减轻其内心的忧虑和恐慌、对谣言进行辟谣等行为都需要专家角色及时进行。如果专家不能及时利用官方信道对非官方信道的错误观点进行纠正，就会让官方信道游离于风险传播之外，起不到抑制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的作用。

以厦门PX事件为例。在厦门PX事件中，尽管PX等化工项目风险在可接受范围，但是从3月初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议迁建厦门PX项目到12月5日中国环境科学院公布环评结果作为专家第一次权威发言，两者之间已经有接近九个月的空窗期，专家代表的学术角度言论不能再官方信道及时发声，对问题的处理没有即时性。这使得非官方信道上充斥着的较为感性激进的舆论充分发酵，最终迫使厦门市政府宣布PX项目迁址。厦门大学邱鸿峰教授对此认为：“应在项目论证阶段就应有专家对风险进行评估，而不是在舆论压力下再做评估，此时群众已经形成的选择性理解将极大地抵消传播效果。”[[7]](#footnote-7)由此可见，即时性时专家进行风险传播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三）专家群体的观点自相矛盾

专家对群众的风险传播建立在明显的知识垄断之下，因此群众缺乏对专家群体言论甄别正误的能力。当专家的言论不统一时，专家进行风险传播时言论的可信度就会明显下降。产生言论不统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专家事先对风险的研究不充分，导致内部的观点尚未达成一致；二是专家群体的内部不纯洁，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专家的名号传播虚假消息以达成自己的利益。如果专家的意见不统一导致官方信道(包括非官方互联网平台上的权威账号等官方平台)的言论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则会使得非官方信道的言论观点混乱，加剧风险的社会放大。

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有争议。自2009年11月27日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以来，各个媒体上都存在各类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争论。这主要体现出了专家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的研究缺乏充足的、权威的研究成果，导致言论分流严重。[[8]](#footnote-8)

《河南日报》报道的保健品欺诈老年人事件中，就存在冒充的“专家”进行药效讲解，借专家这一身份骗取老年人信任。[[9]](#footnote-9)假专家的最大危害就在影响了专家群体的公信力，使得有良知的专家进行风险传播受阻。

（四）专家群体发表言论的方式过于专业化、学术化

群众的专业素养普遍不足，因此对过于学术化的语言，如专业术语、公式符号、固定表达等接受能力比较低。若专家通过官方信道给出的报告等文件只有过于学术化的内容，而没有相应平民化权威解读，群众对官方信道的依赖性就会降低，转而相信不可控的非官方信道的非权威解读。

在上海金山规划环评事件中，环境风险话语权通过传统媒体的专业公式和术语运作，加大了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商谈的难度。官方出版的文件比较专业化，使群众难以读懂其中内容。因为政府是项目的受益者，官方主流媒体的可靠性也遭到了群众的怀疑。[[10]](#footnote-10)同时，国务院批准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措施也因为缺少充分的解读而是公众接收到了错误的信息，让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得不到很好的保障。[[11]](#footnote-11)

表1 专家在风险传播中的不足和在非官方信道产生影响的对比

|  |  |
| --- | --- |
| **专家在风险传播中的不足** | **产生影响** |
| 发言“声音”小 | 影响力低，不能起到风险传播效果 |
| 发言缺乏即时性 | 使得非理性言论充分发酵，不可控制 |
| 观点自相矛盾 | 可信度降低，群众对官方信道的信任程度降低 |
| 言论过于专业化 | 群众难以获得有效信息 |

1. 改进措施

专家在风险传播中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了专家的言论得不到重视。根据上文列出的几点问题，本文尝试给出几点改进措施。

首先专家群体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非官方信道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作用，利用社交平台发言、接受自媒体采访等手段尽可能多次而充分的向公众进行风险传播。

其次在对风险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专家角色应该及时将风险评估等信息告知群众，以起到及时消除谣言、缓解群众中产生的恐慌情绪等作用。

第三，专家应该实现对风险有充分的调查，在尝试将对应科技或产品应用至群众生活中，以保证专家对风险看法的统一性和专家进行风险传播的即时性。

第四，专家应给出自己发言的平台进行权威认证并请公众、同行以及政府等方面进行监督，以保证专家言论的真实性，从而保障专家群体言论的可信度。

最后，专家在对风险进行专业评估之后，应该对专业性、学术性过高、群众难以理解的部分发布较为通俗权威解读，以避免在非权威解读的转述过程中，错误积累产生谣言。

1. 结语

中国式风险传播面临的挑战严峻，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纷繁复杂的。专家在其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在风险传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专家能够使用一种更高效的方式进行风险传播，就更有助于遏制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从而达成一种更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影响风险传播的因素绝不仅有专家，政府、群众也有其应当改进的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1. 曾繁旭、戴佳：《风险传播：通往社会信任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转引自Kasperson,R.E.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8(2),pp.177~187. [↑](#footnote-ref-1)
2. 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08期。 [↑](#footnote-ref-2)
3. 尚悦悦、赵鹏飞：《城市工业安全事故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研究—以吉林双苯厂爆炸事故为例》，《工业安全与环保》2022年09期。 [↑](#footnote-ref-3)
4. 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06期。 [↑](#footnote-ref-4)
5. 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08期。 [↑](#footnote-ref-5)
6.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现代传播》2015年第03期。 [↑](#footnote-ref-6)
7. 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08期。 [↑](#footnote-ref-7)
8. 崔波、马志浩：《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以转基因食品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09期。 [↑](#footnote-ref-8)
9. 汤传稷：《保健品欺诈专盯老年人，啥套路？》，《河南日报》，2022年7月25日。 [↑](#footnote-ref-9)
10. 屠俊：《新媒体传播中环境风险的话语权争议、权力运作和治理路径——以上海金山化工区规划环评事件为例》，《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02期。 [↑](#footnote-ref-10)
11. 崔波、马志浩：《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以转基因食品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09期。 [↑](#footnote-ref-11)